臺灣師大歷史學報　第 53 期
2015 年 6 月，頁 191-206
DOI: 10.6243/BHR.2015.053.191

評介穆渭生，《唐代關內道軍事地理研究》

蔡坤倫*

書　　名：《唐代關內道軍事地理研究》

作　　者：穆渭生

出 版 社：西安：陝西人民出版社

出版時間：2008 年

頁　　數：479 頁

一

歷史地理學分爲自然與人文兩面向，軍事地理屬於歷史人文地理範疇之一。人文地理之提倡，應溯源至嚴耕望、譚其驤二人，其名稱因人因地略有差異。嚴氏首稱「國史人文地理」（1946），計畫從唐代交通著手，次則撰寫唐代人文地理，最後是完成通史性的人文地理。[1]大陸的歷史地理發展是由顧頡剛及其門人譚其驤、侯仁之和史念海共同奠立，分別在上海、北京、西安成立歷史地理研究中心（研究所）。人文地理涵蓋層面有政治、城市、農業、人口、交通、軍事、民族、文化、經濟、社會等，[2]

*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博士候選人

1 嚴耕望，《治史經驗談》（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1988），頁139。

2 歷史人文地理涵蓋層面，詳參林頻編著，《中國歷史地理學研究》（福州：福建人民出版社，2006），頁77-79。

其中交通與軍事密不可分。交通要道上置「關」是歷代統治者防內、外的重要軍事設施。《尉繚子・踵軍令》:「兵有什伍，有分有合，豫爲之職，守要塞關梁而分居之。」[3]《淮南子・兵畧訓》亦云：「硤路津關，一人守隘而千人弗敢過也。」[4]關是交通線發展到一定程度產物，關與交通路線密切性不言而喻。關之所在也是歷代用兵頻繁之處，是以軍事與交通在人文地理研究可謂一體兩面。

唐太宗貞觀初年（627）因山川形便，分天下爲十道，[5]玄宗開元 21 年（733），天下分爲十五道，[6]後代學者針對各道進行研究，舉其學位論文有河東道、關內道、淮南道、嶺南道、江南道、河南道、都畿道等。[7]研究面向或有全面性、或針對軍事、經濟、政治，以朝代爲經，各道爲緯，選其主題做細膩探究，已成一系列固定模式。

作者目前任職於陝西學前師範學院歷史文化與旅遊系，[8]本書是 2002 年博士論文的專書出版，是唐關內道歷史人文軍事地理之全面性研究。對郭子儀的關注亦是作者長期投入的研究成果，先後有《郭子儀評傳》與《大唐盛世──再造大唐郭子儀》兩部專

---

3 作者不詳，張金泉注譯，《新譯尉繚子》（臺北：三民書局，1996），卷4，〈踵軍令〉，頁101。

4 漢・劉安撰，何寧集釋，《淮南子集釋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8），卷15，〈兵畧訓〉，頁1073。

5 北宋・歐陽修、宋祁撰，《新唐書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75），卷37，〈地理志一〉，頁959。

6 北宋・歐陽修、宋祁撰，《新唐書》，卷37，〈地理志一〉，頁960。

7 廖幼華，〈初唐河東道研究──對外策略的研究〉（臺北：中國文化大學歷史碩士論文，1980）。桂齊遜，〈唐代河東軍事研究〉（臺北：中國文化大學歷史碩士論文，1990）。郭啟瑞，〈唐代後期關中防衛中形勢之演變〉（臺北：中國文化大學歷史碩士論文，1985）。謝德隆，〈唐代前期對關內道北部的經營〉（臺北：中國文化大學歷史碩士論文，1992）。朱祖德，〈唐代淮南道研究〉（臺北：中國文化大學歷史碩士論文，1996）。林世清，〈唐代嶺南道研究〉（臺北：中國文化大學歷史碩士論文，1997）。邵承芬，〈唐代江南道研究──以經濟發展為探討重心〉（臺北：中國文化大學歷史博士論文，2003）。趙國光，〈唐代河南道及都畿道與國勢興衰之關係〉（臺北：中國文化大學歷史博士論文，2003）。

8 陝西學前師範學院歷史文化與旅遊系 http://lswh.snie.edu.cn/xkgk/jsdw.htm（查詢時間：2015年5月29日）。

書，[9]期刊論文目前有18篇。[10]作者從郭子儀著手，透過人物的點研究，發展出豐碩的唐代關內道軍事地理成果，本書即是力作之一。

二

本書的上篇是總論（頁1-201），第二章〈唐代戰爭形態與自然地形之關係〉（頁9-44）。唐代軍中常備兵器屬於冷兵器時期，作者認爲宋代以前冷兵器的發展，受到社會生產力和技術水平等因素的侷限，並無革命性的飛躍。唐代北方兵種以步兵和騎兵爲主，步兵行動受限於道路、天氣因素影響較小，其適應性和應變性優於車、騎兵種，騎兵適合大規模決戰。第三章〈關內道自然地形的戰術性能〉（頁45-78）。政區沿革在高祖（618）改郡爲州，太宗貞觀初年（627）分天下爲十道，玄宗開元21年（733）增至十五道。關內道地形主要由高原和盆地組成，長城作爲防禦北方和西北地區的游牧民族，邊防陣線由遮虜障（城堡）、州縣城市、軍城組成。

第四章〈關內道「山河形便」與軍事攻守方向〉（頁79-112）。古代交通運輸有水上與陸地兩類，運輸動力有限，戰爭與帝王巡幸是促使交通發達的原因。關內道主要交通路線，東向有三條（潼關道、武關道、蒲關道），西南行之散關道，通往山南道和劍南道，西北行之隴關道，北邊路線從長安至延州後分兩途，往東

---

9 穆渭生，《郭子儀評傳》（西安：三秦出版社，2000）。穆渭生，《大唐盛世──再造大唐郭子儀》（西安：三秦出版社，2009）。另有穆渭生編著，《大唐盛世──唐楊貴妃》（西安：三秦出版社，2003）。

10 與唐代軍事有關者占最多：如穆渭生，〈秦王李世民與高墌之役〉，《陝西教育學院學報》，12：2（西安，1996.6），頁38-40。穆渭生，〈唐代潼關述略──唐關內道軍事地理研究之一〉，《陝西教育學院學報》，18：4（西安，2002.11），頁63-66。穆渭生，〈唐代宥州變遷的軍事地理考察〉，《中國歷史地理論叢》，18：3（西安，2003.9），頁29-37。穆渭生，〈唐蕃戰爭後期鹽州軍事地理述論〉，《陝西師範大學繼續教育學報》，23：2（西安，2006.6），頁39-43。穆渭生，〈唐代設置六胡州的歷史地理考察〉，《唐都學刊》，23：3（西安，2007.5），頁23-28。陳正奇、穆渭生，〈唐後期隴右失陷與京畿安全危機述略〉，《中國歷史地理論叢》，24：4（西安，2009.10），頁90-102。

北是東道，往西北是中道。長安西北行至邠州後分三途（西支、中支、東支）。南越秦嶺自西往東有六條道路（散關道、褒斜道、儻駱道、子午道、庫谷道、武關道）。第五章〈關內道軍事防禦的地緣戰略與空間形態〉（頁113-132）。唐朝國力以玄宗朝最鼎盛，疆域以高宗中期最廣，此後北部和西域邊疆退縮。京城防禦層次越多，外來入侵勢力消耗越大，保障越是堅固。關內道的三橫三縱是遠圍防線，京畿的諸河道及黃土台原則是近圍防線，護城河與城垣作爲最後一道防線。

第六章〈關內道軍事形勢與防禦部署演變的時空過程〉（頁133-172）。唐代折衝軍府的布局，前期有內重外輕的特色。邊疆地區有十道節度使司（大軍區）的設置。後期京西北諸軍鎮中，鳳翔、涇原、邠寧、靈鹽四鎮處在西抗吐蕃的「前鋒線」上，屬主力大鎮；鄜坊、夏綏兩鎮處於四大主力軍鎮的「後衛線」上，是阻擋吐蕃軍以及党項等勢力迂回關中的屏障；振武、天德兩鎮處於向北防禦回紇的「側邊線」上，與河東鎮一起繼續發揮著盛唐以來陰山防線的軍事功能。第七章〈關內道牧監與屯田的時空變遷〉（頁173-201）。作者以馬俊民、王世平提出監牧、軍鎮、屯田三位一體邊防體制，體現唐前期西北邊防。

本書的下篇是分論（頁203-440）。甲篇是關內道南部軍事地理研究（頁203-330）。關中地區分爲主體的關中盆地（平原）、南面的北秦嶺山地、北面的北山山地、西面的隴山與千山。黃土高原溝壑丘陵地區，高低起伏大，交通極爲不便，以行走於原面爲主，河谷道路輔之。

同州、華州東臨黃河，南面秦嶺，是關中東面門戶，二州地勢南北高，中間低，東西開闊，中間的渭河平原爲農業富庶之區。華州在潼關道上，同州在蒲津道上，二州隔渭水相望，地位相伯仲。河東道的蒲州有龍門關，蒲津關爲潼關的側翼，龍門關又爲蒲津關的側翼，三關呈犄角之勢，三關所在的州亦環環相扣。渭北道至岐州（鳳翔府）後分爲兩大支途，一是往西南的散關道；一爲往西北之隴關道。原州以山地居多，關隘居天下之

首，有原州七關之稱。會州與涇州爲黃土高原溝壑地區，尤其是涇州地形比較開闊平夷，在軍事上易攻難守，成爲安史亂後西抗吐蕃重兵駐紮之地。延州道以延州爲樞紐，向南、北兩面延伸，而且周圍多關。

乙篇是關內道北部軍事地理研究（頁331-440）。鄂爾多斯高原的西、北、東三面爲黃河環繞，南以長城與陝北臨界，爲內蒙古高原的南部。靈州掌控南北交通，是華夷行走要衝，軍事戰略地位突出。夏州至綏州道路有夏綏道，至鹽州的夏鹽道，至銀州的夏銀道，到達銀州後，又分爲趨東南通往綏州及河東道，趨東北通往麟、勝州方向，再從勝州榆林關（津）渡河通往河套、陰山。唐代黃河北岸的軍城，先後有單于都護府和三受降城等，東西呼應，這幾座軍城的位置有的沿自前代，有的擇地新築，皆與陰山上的南北交通隘口或溝谷相對應。此外，唐前期陰山防線建設的時空過程，大致上可劃分爲四階段，其實行的邊防體制，實爲都督府、都護府、節度使司三種。

三

本書以朝代爲時間軸，區域爲空間軸，論其歷史人文地理的軍事面。以下針對章節架構、資料引用、書寫方式等三個面向與作者商榷。

第一，章節架構方面。本書分上篇總論，共七大章，下篇分論，計有甲、乙兩部分，由於內容豐富，小標題多且細膩，使讀者一目了然，但仍有缺漏之處。首先是上篇除第一章緒論外，第二、三、六章各有小結，獨缺四、五、七章的小結，且最後未有總結論，無法收其畫龍點睛之效。其次是目錄與正文標號未統一，第七章第二節「互市」兩字，目錄有標號強調，正文則缺（頁176）。復次是標號格式有誤，第七章從第二、三、四節開始，第二層標號應是（一）、（二）……，第三層標號是1、2……，以此類推，對應前面章節的層次架構，作者從第二節開始，標號格式似顯凌亂（頁176-201），宜做統整，並且在目錄上重新調

整。同樣地，在下篇分論乙部分的第二章，如果對應作者在 384 頁的（1）「後套」平原的標號採用的（ ）的方式，則383頁的①狼山，以及386頁的①黃河磴口──喇嘛灣段，皆應改爲（1）這一階層標號格式才是。由於本書內容豐富，章節架構的清晰更有助於讀者精準掌握作者本意。

第二，資料引用方面，首先是《元和郡縣圖志》華陰縣屬於關內道華州，永豐倉位於華陰縣東北35里渭河口，[11]作者誤引《元和郡縣圖志》，認爲永豐倉在同州華縣（頁219 注 1）。其次，《元和郡縣圖志》記載韓城縣位於同州，距離是「西南至州二百里。」[12]也就是同州東北方200里是韓城縣，作者誤引爲東北80 里至韓城縣（頁229 注 2）。再次，龍門山與龍門戍分別在韓城縣北 50 里與東北方，[13]作者說兩者皆位於韓城縣東北 50 里（頁229）。此外，龍門關據《元和郡縣圖志》記載，後周時於龍門戍設置，在憲宗元和八年（813）廢除，龍門戍在唐代位於關內道的韓城縣，唐代龍門關位於河東道絳州龍門縣西北 22 里，[14]可見關城設置有其時代與政區沿革，作者僅言「唐代河東絳州龍門縣有龍門關，河西韓城縣有龍門戍，乃是夾河而置關防。」（頁229）卻未見任何註解，恐使讀者不易掌握此關的時代變遷。

關於安夷關的地理位置，作者引《元和郡縣圖志》記載，「安夷關在（南由）縣西 146里；南由縣在隴州西南120里、渭水北岸40里。」（頁270）查譚其驤圖，[15]安夷關並非在南由縣正西方，而在西北方，南由縣也不在隴州西南，而在東南方，雖說譚圖是以開元二十九年（741）繪製該圖，時代上早於李吉甫，是否在縣或關城有其時代變遷，應於註解中加以說明。烏仁關的地理位置同樣使人產生疑竇，作者認爲烏仁關在延州東南方，是控制黃河上

---

11 唐．李吉甫撰，賀次君點校，《元和郡縣圖志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3），卷2，〈關內道二〉，頁33-35。

12 唐．李吉甫撰，賀次君點校，《元和郡縣圖志》，卷2，〈關內道二〉，頁36-38。

13 唐．李吉甫撰，賀次君點校，《元和郡縣圖志》，卷2，〈關內道二〉，頁38。

14 唐．李吉甫撰，賀次君點校，《元和郡縣圖志》，卷12，〈河東道一〉，頁336。

15 譚其驤，《中國歷史地圖集》（第五冊）（北京：中國地圖出版社，1982），頁40-41。

的津渡之一（頁303），不過，頁313提到的烏仁關卻記載在丹州下，譚圖此關也繪製在丹州。[16]因此，烏仁關的位置究竟在延州抑或丹州，有進一步作說明的必要。

本書既爲區域性的軍事地理研究，關防設置如人體關節，掌控著交通路線的通行與否，不可避免涉及到諸多關防的陳述，整體而言，作者在關防資料的引用較不足，單篇論文屬於關的文獻有〈歷史上的子午道〉、〈潼關創建年代考辨〉、〈歷史時期潼關城址的變遷〉、〈唐大震關考〉、〈森林、道路與關隘──試說函谷關與潼關之興替〉五篇，涵蓋層面限於子午關、潼關、大震關、函谷關，顯然與作者在頁126-128所表列的關內道關防數量至少有30個，引用資料比例上不符合。就筆者所知，京畿道同州的蒲津關、[17]岐州的大散關、[18]京兆府的子午關、[19]駱谷關、[20]藍田關、[21]商州的

---

16 譚其驤，《中國歷史地圖集》（第五冊），頁40-41。

17 陸敬嚴，〈蒲津大浮橋考〉，《自然科學史研究》，4：1（北京，1985.3），頁35-41。張思足，〈連接秦晉有一橋──唐代的蒲津大浮橋考略〉，《西安教育學院學報》，1998：4（西安，1998.12），頁5-8。王元林，〈蒲津大浮橋新探〉，《文物季刊》，1999：3（太原，1999.9），頁52-58。劉永生，〈古城古渡古橋──永濟黃河蒲津渡遺址考古瑣記〉，《文物世界》，2000：4（太原，2000.12），頁4-8。姚春敏、趙曉峰，〈試論唐王朝修建「蒲津橋」的經濟目的與動機〉，《運城學院學報》，26：6（運城，2008.12），頁18-21。關治中、李金俠，〈臨晉關考證──關中要塞研究之五〉，《渭南師範學院學報（社會科學版）》，15：3（渭南，2000.6），頁111-115。

18 梁福義，〈古散關遺址辨正〉，《人文雜誌》，1984：1（西安，1984.2），頁36。李仲操，〈歷代散關遺址小考〉，《人文雜誌》，1985：6（西安，1985.12），頁74-75。馬正林，〈關於古散關遺址〉，《陝西師範大學學報（哲學社會科學版）》，1986：1（西安，1986.3），頁105-106。郭清華，〈陳倉道初探──兼論「暗度陳倉」與陳倉道有關問題〉，《成都大學學報（社會科學版）》，1989：2（成都，1989.6），頁100-106。李之勤，〈陳倉古道考〉，《中國歷史地理論叢》，23：3（西安，2008.7），頁118-124。

19 李之勤，〈《讀史方輿紀要》卷五六《子午道》條校釋〉，《中國歷史地理論叢》，2000：3（西安，2000.9），頁27-38。

20 李之勤，〈儻駱古道的發展特點、具體走向和沿途要地〉，《文博》，1995：2（西安，1995.4），頁44-53。李之勤，〈《讀史方輿紀要》陝西省漢中府「儻駱道」條校釋〉，《中國歷史地理論叢》，2000：1（西安，2000.3），頁229-237。徐志斌，〈論唐代儻駱道的特點與價值〉，《陝西理工學院學報（社會科學版）》，29：3（漢中，2011.8），頁17-20，轉29頁。雷震，〈歷史時期的儻駱道及其作用〉，《陝西理工學院學報（社會科學版）》，29：4（漢中，2011.11），頁40-44。

21 李之勤，〈藍田縣的兩個石門與唐長安附近藍武道北段的水陸聯運問題〉，《中國歷史地理論叢》，1992：2（西安，1992.6），頁63-70。劉樹友，〈秦嶺諸關考──關

武關、[22]華州的潼關。[23]關內道原州七關、[24]會州的烏蘭關、[25]隴州的大震關。[26]個別關的研究有助於釐清各關地理位置、沿革等，進

中要塞研究之四〉，《渭南師專學報（社會科學版）》，14：4（渭南，1999.8），頁23-27，轉46頁。陳維緒，〈漢唐嶢關、藍關考略──兼與牛樹林、郭敏厚先生商榷〉，《商洛學院學報》，20：1（商洛，2006.3），頁28-29，轉46頁。牛樹林、郭敏厚，〈秦漢嶢關、唐藍關小考〉，《商洛學院學報》，22：3（商洛，2008.6），頁1-4。牛樹林、郭敏厚、耶磊，〈秦漢嶢關、唐藍關續考──從文獻所載「藍田縣東南」的里程說起〉，《商洛學院學報》，23：1（商洛，2009.2），頁46-48。

22 侯甬堅，〈論唐以前武關的地理位置〉，《陝西師範大學學報（哲學社會科學版）》，1986：3（西安，1986.9），頁82-88。後收入侯甬堅，《歷史地理學探索》（北京：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，2004），頁304-316。王昌富，〈早期武關地望初探〉，《文博》，1989：4（西安，1989.8），頁20-22，轉82頁。劉樹友，〈武關考──關中要塞研究之七〉，《渭南師範學院學報》，17：3（渭南，2002.5），頁44-49。余方平、王昌富，〈武關早期位置探索新論〉，《商洛學院學報》，22：1（商洛，2008.2），頁27-31。

23 史念海，〈潼關古城的遷徙〉，收入史念海，《河山集》（二集）（北京：三聯書店，1981），頁176-180。許正文，〈潼關沿革考〉，《人文雜誌》，1989：5（西安，1989.10），頁93-97。賀潤坤，〈安史之亂中潼關為何失守〉，《漢中師院學報（哲學社會科學版）》，1989：4（漢中，1989.12），頁47-50。關治中，〈論曹操平定關隴的奠基戰役──潼關之戰〉，《西北大學學報（哲學社會科學版）》，22：1（西安，1992.3），頁27-31。關治中，〈潼關天險考證──關中要塞研究之三〉，《渭南師專學報（社會科學版）》，14：3（渭南，1999.6），頁35-39。劉樹友，〈「哥舒白谷兩英雄，痛哭催軍萬年淚」──唐軍與安史叛軍的潼關、靈寶之戰探析〉，《渭南師專學報（社會科學版）》，12：1（渭南，1997.3），頁27-34。艾冲，〈古代潼關城址的變遷〉，《歷史地理》，2002：18（上海，2002.6），頁122-129。艾冲，〈潼關創建年代考辨〉，《渭南師專學報（社會科學版）》，15：1（渭南，2000.2），頁10-13，轉17頁。案：作者誤引為〈歷史時期潼關城址的變遷〉。穆渭生，〈唐代潼關述略──唐關內道軍事地理研究之一〉，頁63-66。梁建邦，〈潼關古城的建制〉，《滄桑》，2005：2（太原，2005.3），頁17，轉24頁。李健超，〈函谷關與潼關〉，收入李健超，《漢唐兩京及絲綢之路歷史地理論集》（西安：三秦出版社，2007），頁595-605。

24 蘇瑩輝，〈唐宣宗收復河湟地區與三州七關的年代略論〉，收入中國唐代學會編，《唐代研究論集》（第一輯）（臺北：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，1992），頁773-808。史念海，〈唐代原州的木峽關和石門關〉，收入史念海，《河山集》（七）（西安：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，1999），頁239-248。馬東海，〈唐木峽關、摧沙堡、石門關考〉，《寧夏師範學院學報（社會科學版）》，31：4（固原，2010.8），頁20-22。

25 孫長龍，〈唐會州及其屬縣、關口考〉，《絲綢之路》，2009：16（蘭州，2009.8），頁45-47。

26 吳洁生，〈唐大震關考〉，《歷史地理》，1990：7（上海，1990.6），頁134-138。楊軍輝，〈關於唐大震關的幾個問題〉，《甘肅農業》，2006：6（蘭州，2006.6），頁292-293。關治中、王克西，〈隴山諸關考──關中要塞研究之六〉，《渭南師範學院學報》，17：1（渭南，2002.1），頁58-61。蘇海洋、雍際春、晏波、龍曉妮，〈唐

而拓展軍事地理研究的深度。

第三，書寫方式方面，首先是頁 9 倒數第 3 行提到中國軍事史上，兵器的製造和發展劃分爲兩大時段，從下文敘述可知，遠古到五代十國屬於冷兵器時代，北宋到清中葉屬於冷兵器與火器並用時代，1860 年以後，自強運動興起，新式槍砲取代冷兵器和舊式火器，屬於火器戰爭時代，顯然歷經冷兵器、冷兵器與舊式火器並存的過渡階段、新式火器三大階段，火器時代有新舊之別，作者認爲兩大階段應屬於冷兵器與火器時代，抑或其他？應再做說明。其次是頁 10 第 2 段，作者提到冷兵器依製作材料，歷經石製、青銅、鋼鐵兵器。不過，同頁第 1 段又提到木石、青銅、鋼鐵兵器。頁12第1段則分爲木、石、青銅、鋼鐵兵器四類，顯然在石製兵器之前有木製階段，應在前後文章敘述稍作統一，以免讓讀者霧裡看花。

作者在首章緒論提到本書的思維邏輯是以今論古，同時以古知今的寫作方式。因此，往往在敘述唐代關內道軍事地理之前，會有不少篇幅與唐代內容無關，如頁 12-13、56、70、80、90、93、100、117、118，或將無關內容採夾敘夾議方式於正文中論述。竊以爲既然本書時間軸設定在唐代，空間軸是關內道，除非必要，否則應盡可能捨棄或置於註解中，使得本書更加簡潔有力，突顯真正唐代關內道的軍事地理精華所在。

唐代關內道研究在本書出版之前，較具分量者有前述〈唐代後期關中防衛中形勢之演變〉（1985）、〈唐代前期對關內道北部的經營〉（1992）兩篇碩士論文，時間上針對唐朝的前、後期，內容上則就防衛形勢的轉變，以及北部的經營進行探討。歷經數十餘年，才再度有針對唐代關內道的研究問世，而且是以歷史人文地理的軍事角度切入，可說是一部創新與全面性地了解唐代關內道的專著，雖有上述枝微末節之不足，[27]仍瑕不掩瑜，提供後來

蕃古道大震關至鄯城段走向新考〉，《青海民族大學學報（社會科學版）》，37：3（西寧，2011.7），頁62-67。

27 本書頁284第12行第4字後面遺漏「政」字。頁383第5行寫為「灰騰梁山」，頁384第4行則作「灰騰凉山」，「梁」或「凉」應再做統一。

學者可以再以唐代某「道」爲核心，從事軍事地理研究，逐步拓展成歷史人文地理的宏觀論述。

引用書目

一、史籍

作者不詳，張金泉注譯，《新譯尉繚子》，臺北：三民書局，1996。
漢．劉安撰，何寧集釋，《淮南子集釋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8。
唐．李吉甫撰，賀次君點校，《元和郡縣圖志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3。
北宋．歐陽修、宋祁撰，《新唐書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75。

二、專書

林頫編著，《中國歷史地理學研究》，福州：福建人民出版社，2006。
侯甬堅，《歷史地理學探索》，北京：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，2004，頁 304-316。
穆渭生，《大唐盛世──再造大唐郭子儀》，西安：三秦出版社，2009。
穆渭生，《郭子儀評傳》，西安：三秦出版社，2000。
穆渭生編著，《大唐盛世──唐楊貴妃》，西安：三秦出版社，2003。
嚴耕望，《治史經驗談》，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1988。

三、近人論文

（一）期刊、專書論文

牛樹林、郭敏厚，〈秦漢嶢關、唐藍關小考〉，《商洛學院學報》，22：3（商洛，2008.6），頁 1-4。
牛樹林、郭敏厚、耶磊，〈秦漢嶢關、唐藍關續考──從文獻所載「藍田縣東南」的里程說起〉，《商洛學院學報》，23：1（商洛，2009.2），頁 46-48。
王元林，〈蒲津大浮橋新探〉，《文物季刊》，1999：3（太原，1999.9），頁 52-58。
王昌富，〈早期武關地望初探〉，《文博》，1989：4（西安，1989.8），頁 20-22，轉 82 頁。
史念海，〈唐代原州的木峽關和石門關〉，收入史念海，《河山集》（七），西安：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，1999，頁 239-248。
史念海，〈潼關古城的遷徙〉，收入史念海，《河山集》（二集），北京：三聯書店，1981，頁 176-180。
艾冲，〈古代潼關城址的變遷〉，《歷史地理》，2002：18（上海，2002.6），頁122-129。

艾冲，〈潼關創建年代考辨〉，《渭南師專學報（社會科學版）》，15：1（渭南，2000.2），頁 10-13，轉 17 頁。

余方平、王昌富，〈武關早期位置探索新論〉，《商洛學院學報》，22：1（商洛，2008.2），頁 27-31。

吳洁生，〈唐大震關考〉，《歷史地理》，1990：7（上海，1990.6），頁 134-138。

李之勤，〈《讀史方輿紀要》卷五六《子午道》條校釋〉，《中國歷史地理論叢》，2000：3（西安，2000.9），頁 27-38。

李之勤，〈《讀史方輿紀要》陝西省漢中府「儻駱道」條校釋〉，《中國歷史地理論叢》，2000：1（西安，2000.3），頁 229-237。

李之勤，〈陳倉古道考〉，《中國歷史地理論叢》，23：3（西安，2008.7），頁118-124。

李之勤，〈藍田縣的兩個石門與唐長安附近藍武道北段的水陸聯運問題〉，《中國歷史地理論叢》，1992：2（西安，1992.6），頁 63-70。

李之勤，〈儻駱古道的發展特點、具體走向和沿途要地〉，《文博》，1995：2（西安，1995.4），頁 44-53。

李仲操，〈歷代散關遺址小考〉，《人文雜誌》，1985：6（西安，1985.12），頁 74-75。

李健超，〈函谷關與潼關〉，收入李健超，《漢唐兩京及絲綢之路歷史地理論集》，西安：三秦出版社，2007，頁 595-605。

侯甬堅，〈論唐以前武關的地理位置〉，《陝西師範大學學報（哲學社會科學版）》，1986：3（西安，1986.9），頁82-88。

姚春敏、趙曉峰，〈試論唐王朝修建「蒲津橋」的經濟目的與動機〉，《運城學院學報》，26：6（運城，2008.12），頁 18-21。

孫長龍，〈唐會州及其屬縣、關口考〉，《絲綢之路》，2009：16（蘭州，2009.8），頁 45-47。

徐志斌，〈論唐代儻駱道的特點與價值〉，《陝西理工學院學報（社會科學版）》，29：3（漢中，2011.8），頁 17-20，轉 29 頁。

馬正林，〈關於古散關遺址〉，《陝西師範大學學報（哲學社會科學版）》，1986：1（西安，1986.3），頁 105-106。

馬東海，〈唐木峽關、摧沙堡、石門關考〉，《寧夏師範學院學報（社會科學）》，31：4（固原，2010.8），頁 20-22。

張思足，〈連接秦晉有一橋──唐代的蒲津大浮橋考略〉，《西安教育學院學報》，1998：4（西安，1998.12），頁 5-8。

梁建邦，〈潼關古城的建制〉，《滄桑》，2005：2（太原，2005.3），頁17，轉24頁。
梁福義，〈古散關遺址辨正〉，《人文雜誌》，1984：1（西安，1984.2），頁36。
許正文，〈潼關沿革考〉，《人文雜誌》，1989：5（西安，1989.10），頁93-97。
郭清華，〈陳倉道初探──兼論「暗度陳倉」與陳倉道有關問題〉，《成都大學學報（社會科學版）》，1989：2（成都，1989.6），頁100-106。
陳正奇、穆渭生，〈唐後期隴右失陷與京畿安全危機述略〉，《中國歷史地理論叢》，24：4（西安，2009.10），頁90-102。
陳維緒，〈漢唐嶢關、藍關考略──兼與牛樹林、郭敏厚先生商榷〉，《商洛學院學報》，2006：1，頁28-29，轉46頁。
陸敬嚴，〈蒲津大浮橋考〉，《自然科學史研究》，1985：1，頁35-41。
賀潤坤，〈安史之亂中潼關爲何失守〉，《漢中師院學報（哲學社會科學版）》，1989：4（漢中，1989.12），頁47-50。
楊軍輝，〈關於唐大震關的幾個問題〉，《甘肅農業》，2006：6（蘭州，2006.6），頁292-293。
雷震，〈歷史時期的儻駱道及其作用〉，《陝西理工學院學報（社會科學版）》，29：4（漢中，2011.11），頁40-44。
劉永生，〈古城古渡古橋──永濟黃河蒲津渡遺址考古瑣記〉，《文物世界》，2000：4（太原，2000.12），頁4-8。
劉樹友，〈「哥舒白谷兩英雄，痛哭催軍萬年淚」──唐軍與安史叛軍的潼關、靈寶之戰探析〉，《渭南師專學報（社會科學版）》，12：1（渭南，1997.3），頁27-34。
劉樹友，〈武關考──關中要塞研究之七〉，《渭南師範學院學報》，17：3（渭南，2002.5），頁44-49。
劉樹友，〈秦嶺諸關考──關中要塞研究之四〉，《渭南師專學報（社會科學版）》，14：4（渭南，1998.8），頁23-27，轉46頁。
穆渭生，〈唐代宥州變遷的軍事地理考察〉，《中國歷史地理論叢》，18：3（西安，2003.9），頁29-37。
穆渭生，〈唐代設置六胡州的歷史地理考察〉，《唐都學刊》，23：3（西安，2007.5），頁23-28。
穆渭生，〈唐代潼關述略──唐關內道軍事地理研究之一〉，《陝西教育學院學報》，18：4（西安，2002.11），頁63-66。

穆渭生，〈唐蕃戰爭後期鹽州軍事地理述論〉，《陝西師範大學繼續教育學報》23：2（西安，2006.6），頁 39-43。

穆渭生，〈秦王李世民與高墘之役〉，《陝西教育學院學報》，12：2（西安，1996.6），頁 38-40。

關治中，〈潼關天險考證──關中要塞研究之三〉，《渭南師專學報（社會科學版）》，14：3（渭南，1999.6），頁 35-39。

關治中，〈論曹操平定關隴的奠基戰役──潼關之戰〉，《西北大學學報（哲學社會科學版）》，22：1（西安，1992.3），頁 27-31。

關治中、王克西，〈隴山諸關考──關中要塞研究之六〉，《渭南師範學院學報》，17：1（渭南，2002.1），頁 58-61。

關治中、李金俠，〈臨晉關考證──關中要塞研究之五〉，《渭南師範學院學報（社會科學版）》，15：3（渭南，2000.6），頁 111-115。

蘇海洋、雍際春、晏波、龍曉妮，〈唐蕃古道大震關至鄯城段走向新考〉，《青海民族大學學報（社會科學版）》，37：3（西寧，2011.7），頁 62-67。

蘇瑩輝，〈唐宣宗收復河湟地區與三州七關的年代略論〉，收入中國唐代學會編，《唐代研究論集》（第一輯），臺北：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，1992，頁 773-808。

（二）學位論文

朱祖德，〈唐代淮南道研究〉，臺北：中國文化大學歷史碩士論文，1996。

林世清，〈唐代嶺南道研究〉，臺北：中國文化大學歷史碩士論文，1997。

邵承芬，〈唐代江南道研究──以經濟發展爲探討重心〉，臺北：中國文化大學歷史博士論文，2003。

桂齊遜，〈唐代河東軍事研究〉，臺北：中國文化大學歷史碩士論文，1990。

郭啓瑞，〈唐代後期關中防衛中形勢之演變〉，臺北：中國文化大學歷史碩士論文，1985。

廖幼華，〈初唐河東道研究──對外策略的研究〉，臺北：中國文化大學歷史碩士論文，1980。

趙國光，〈唐代河南道及都畿道與國勢興衰之關係〉，臺北：中國文化大學歷史博士論文，2003。

謝德隆，〈唐代前期對關內道北部的經營〉，臺北：中國文化大學歷史碩士論文，1992。

四、地圖

譚其驤，《中國歷史地圖集》，北京：中國地圖出版社，1982。

五、網路資料

陝西學前師範學院歷史文化與旅遊系http://lswh.snie.edu.cn/xkgk/jsdw.htm（查詢時間：2015年5月29日）。